



明清文学与文献

杜桂萍

主编

第一辑

黑龙江大学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



NLIC2970860653

黑龙江大学出版社

黑龙江大学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

明清文学与

文献

第一辑



NLIC2970860663

黑龙江大学出版社

杜桂萍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清文学与文献. 第1辑 / 杜桂萍主编. -- 哈尔滨:
黑龙江大学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81129-576-4

I. ①明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古典文学研
究-明清时代-文集 IV. ①I206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9402 号

明清文学与文献(第一辑)

MINGQING WENXUE YU WENXIAN(DI-YI JI)

杜桂萍 主编

特约编辑	李亦辉
责任编辑	安宏涛
出版发行	黑龙江大学出版社
地 址	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
印 刷	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× 1092 1/16
印 张	26.75
字 数	383 千
版 次	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1129-576-4
定 价	59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戏曲研究

- 《琵琶记》表微 李光摩 (3)
- 论《元曲选》与元杂剧体制的定型 刘建欣 (24)
- “借宫”问题与《北词广正谱》的曲学探索 魏洪洲 (54)
- 乾嘉学者及戏曲家胡重生平事迹考述 杜桂萍 (76)

小说研究

- 《三国志演义》君臣关系的良性形态 关四平 (107)
- 以张昭与孙氏兄弟的关系为中心
- 《西游记》人物形象与主题新议 宋皓琨 (131)
- 兼与《水浒传》比较
- 《封神演义》作者问题检讨 李亦辉 (147)
- 《儒林外史》仿拟《水浒传》之“道”与“术” 李桂奎 (165)

《红楼梦说梦》作者二知道人新考	赵春辉 (178)
论读者对晚清民初翻译小说文本的影响	陈才训 (197)

诗 文 研 究

明代婢女文学创作繁荣现象之历史解析	王雪萍 (215)
《江南春词》倡和集相关问题考辨	何丽娜 (234)
晚明时曲影响下曲化词创作情况述略	胡元翎 (254)
清代“千叟宴”与“千叟宴诗”考论	朱则杰 (277)
王士禛散文的地位和美学特色分析	李金慧 (309)
一档馆藏洪亮吉督学贵州相关奏折考释	许隽超 孙 超 (321)
绘、题《诗龕图》与法式善诗坛地位的确立	李淑岩 (337)
“天风吹我下蓬瀛”:俞樾罢官考论	马丽敏 (354)

学 术 史 研 究

金圣叹史实研究的现代历程	陆 林 (379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后 记	(424)
-----------	-------



戏曲研究

《琵琶记》表微

李光摩

一、高明的遗民身世

关于高明的卒年,明清以来基本认为是卒于明初的。但在1962年之后,情况发生了转变。湛之据清代陆时化《吴越所见书画录》卷一载高明《题〈晨起〉诗卷》云云,落款是“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辰”,同时又有余尧臣题记云:“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权势,病卒四明。”^①于是,推算出高明卒于至正十九年。较之笼统的明初说,这一说法显得极为精确,故后来的文学史多采用之。然而,这一证据,实是考据上所谓的孤证。对于孤证的处理,梁启超发表过很好的意见:“孤证不为定说。其无反证者姑存之,得有续证则渐信之,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。”^②明初说虽然失之笼统,但毕竟《明史稿》、《明史》及

^① 转引自湛之《高明的卒年》,载《文史》第一辑,1962年。

^② 梁启超: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,第44页。

多种地方志皆采之,影响是巨大的。退一步说,即便这些说法出自同一源头,一条孤证是否就足以否定它呢?况且,高明《题〈晨起〉诗卷》及其题跋是否传世?高、余二人所写是否真迹?陆时化过录时有无错漏?在这些问题弄清楚之前,至正十九年说应该存疑。^①鉴于此,在高明卒年问题上,本文认同明初说。为张此说,下举三例证之:

其一,高明尝赠魏寿延诗一首,《子素先生客夏盖湖上,欲往见而未能,因赋诗,用简仲远征君同发一笑》:

夏盖山前湖水平,杨梅欲熟雨冥冥。吴门乱后逢梅福,辽海来时识管宁。野雾连村迷豹隐,江风吹浪送鱼腥。伯阳旧有参同契,好共云孙讲易经。^②

诗题中子素即潘纯,徐显《稗史集传》详载其事,盖滑稽多智之士,尝模仿《周易》著《袞卦》以讽切当世。至正十二年两淮兵起,子素避地绍兴,然其人“知避其身不知避其言”,终因得罪权贵之子,遭遇不测。^③仲远即魏寿延,《敦文集》的编者。魏氏于此集辑其友人酬赠之诗凡七十六首,其中高明诗两首,第一首为《丁酉二月二日访仲仁仲远仲刚贤昆季别后赋诗以谢》,第二首即此也。

从诗题看,子素尝客居夏盖湖仲远之别业,作者欲访之而未果。此诗寄给仲远,理应给子素一观,然而,作者却没有这个意思。这说明子素此时已不在夏盖湖。又,此诗若作于子素生前,即至正十九年之前^④,此时江浙之地战乱频仍,则“吴门乱后”二句无所安顿,故此诗应作于子素身后,此诗即由追忆而起。陈衍《元诗纪事》载“吴门乱后逢梅福,辽海来时识管宁”诗句,并

① 近年徐永明撰写《高则诚生平行实新证》一文,以确凿材料证明高明至迟在至正二十年依然在世,表明高明卒于至正十九年之说不能成立,载《文学遗产》2006年第2期。

② 顾嗣立:《元诗选》三集,中华书局1987年版,第449页。

③ 徐显:《稗史集传》,四库存目丛书本史部第87册,第680页。

④ 关于潘纯卒年的推测,采用黄仕忠的说法,见其《琵琶记研究》,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,第34页。

引《箨石斋诗集》云,此诗“当在廿七年丁未后。是年明祖破平江,方国珍降,浙东西甫宁静也”^①。笔者认同此说。

诗中“杨梅欲熟”表明此诗最早当作于至正二十八年初夏,此年亦即洪武元年,除非有证据表明高明在朱元璋改正朔之前即已辞世,否则,他的卒年必在明初。又,此诗用梅福、管宁之典,皆为易代之际的故实,亦可说明其写作年代当在元亡之后。梅福,《汉书》本传云:“至元始中,王莽颛政,福一朝弃妻子,去九江,至今传以为仙。其后,人有见福于会稽者,变名姓,为吴市门卒云。”^②管宁,《三国志》本传云汉末避乱辽东,后归,魏文帝、明帝赐官皆不受。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云,管宁避地辽东,谓邴原曰:“潜龙以不见成德,言非其时,皆招祸之道也。”^③此点引起宋遗民王应麟的共鸣:“潜龙以不见成德,管宁所以箴邴原也。全身以待时,杜袭所以戒繁钦也。”翁元圻引吕东莱《史说》注曰:“处危乱之际,正不可露圭角。邴原于干戈扰攘之区,乃一一欲以清议格之,自然招祸。此不知与时消息之理。”^④诗人盖借此诗与魏仲远共勉,易代之际,当师梅福、管宁,而以潘纯为戒,深自隐匿,学道修仙,庶几可与云孙共研易经,以待贞元。

其二,高明卒后,陆德旸以诗哭之:

乱离遭世变,出处叹才难。坠地文将丧,忧天寝不安。名题前进士,署罢旧郎官。一代儒林传,真堪入史刊。^⑤

此是友人对高明的盖棺定论。开首两句总括,则诚遭逢乱世,出则为能吏,处则为节士,是难得的人才;三、四句分写出仕,忧国忧民;五、六句分写退隐,难忘故国;最后两句绾结,儒林楷模,可入史传。此诗亦表明高明是卒于易代之后的,其中的关键在于“名题前进士”一联。我们知道唐代的进士被

① 陈衍辑:《元诗纪事》卷十九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452页。

② 班固:《汉书》卷六十七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2927页。

③ 陈寿:《三国志集解》,裴松之注,卢弼集解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,第1113页。

④ 王应麟:《困学纪闻》卷一,翁元圻等注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,第3页。

⑤ 田艺蘅:《留青日札》卷十九,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29册,第161页。

称作前进士，元代的进士如何称呼呢？赵汭至正十一年序苏天爵文集云：“《滋溪文稿》三十卷，浙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公之文，前进士永嘉高明、临川葛元哲为属掾时所类次也。”^①这表明元代和唐代一样，也称前进士。那么，曾辅佐明朝之元进士又如何自称呢？宋濂《送许时用还越中序》提供了例证。洪武二年，许汝霖辞官归隐，其理由之一就是“余先朝进士也”^②。高明是进士，在元代当然要称“前进士”。如果高明终生生活在元代，“名题前进士”，人人如此，根本没有什么值得褒扬的，何必有“才难”之叹，“史刊”之赞呢？只有在易代之后，高明依然“名题前进士，爵署旧郎官”，表明了他对新政权的不合作态度，说明在他眼里，元祚依旧。这才引起诗人赞美，“一代儒林传，真堪入史刊”。此诗同时也表明了高明的遗民身份。

其三，高明之别号透露的信息。易代之际，不少仁人志士通过改变名字别号来表达自己的志向。如陶渊明易代之后更名潜，山谷《怀陶令》诗云：“潜鱼愿深渺，渊明无由逃。”吴仁杰引此而论之曰：“盖言‘渊明’不如‘潜’之为晦，此尤得先生更名之意。”^③王应麟易代之后自号深宁，出自《庄子·缮性篇》：“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，则深根宁极而待，此存身之道也。”顾炎武原名绛，易代之后取字宁人，盖亦源于此，皆深自隐匿，不合时流之意也。《周易》“明夷”之《彖》曰：“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以蒙大难，文王以之。利艰贞，晦其明也。内难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。”君子处于明夷这个黑暗艰难的时代，要晦藏其明，不失其志。是故黄梨洲明夷以待访，顾亭林穷经以待后。这表明箕子在遗民心目中实乃一崇高楷模也。高明晚年诗文结集为《柔克斋集》，此柔克盖其晚年所取之斋名。按，“高明柔克”，出自《尚书·洪范》，而《洪范》亦被称为《商书》。王应麟释之曰：“《左氏传》引《商书》曰：‘沉潜刚克，高明柔克。’《洪范》言‘惟十有三祀’，箕子不忘商也，故谓之《商书》。陶渊明于义熙后，但书甲子，亦箕子之志也。”（《困学纪闻》卷二）由是言之，高明柔克之号，盖鼎革之后师箕子不忘商之意也。

① 赵汭：《滋溪文稿序》，载《东山存稿》卷二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1册。

② 宋濂：《文宪集》卷八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3册，第464页。

③ 吴仁杰：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，载王质等《陶渊明年谱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24页。

通过以上论述,笔者认为高明是卒于明初的,同时还是一位遗民,他对朱明新政权是采取不合作态度的。章学诚云:“不知古人之世,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;知其世矣,不知古人之身处,亦不可遽论其文矣。”^①这就是知人论世的态度。了解了高明的身世,才可能对《琵琶记》产生较为真切的认识。

高明之所以成为遗民,与他一贯重视孝义、强调气节的思想密不可分。赵汭曾称赞他“雅以名节自励”(《送高则诚归永嘉序》),刘基也说他“少小慕曾闵”(《从军诗五首送高则诚南征》)。徐渭《南词叙录》著录高明尝作《闵子骞单衣记》,而闵子骞则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子。此外,他还有《孝义井记》等宣扬孝义的作品。高明为何这么热衷表彰孝义呢?《华孝子故址记》一文颇能说明其志趣:

孝子晋人,而志谓齐孝子者,盖孝子生于晋,长于宋,没于齐。当其一身而天下三易姓。当时居朝廷有爵位者,朝事司马氏夕事刘,朝事刘夕事萧,恬不以为怪。而孝子奉父一言,七十年余,未尝斯须忘,以至没身不替。使当时有爵位者,其奉君命,恪官守,亦咸若华氏子,则晋不当为宋,宋不当为齐,而孝子宜不曰齐孝子也。^②

高明之意,此孝子谨奉父命,历晋宋齐七十余年不改,宜称之为晋孝子而非齐孝子。天下臣子若能皆如华孝子,则必为忠臣义士,何至于朝代轮番更替呢?

元末明初,宣扬孝义的当然不是高明一人,王逢也是非常积极的一位遗民。四库馆臣论其《梧溪集》云:“集中载宋元之际忠孝节义之事甚备……盖其微意所寓也。”^③到底是什么微意呢?钱牧斋揭示了谜底:“夷齐之不忘殷也,原吉之不忘元也,其志一也。”^④在儒家的伦理序列中,孝是先于忠的,故

① 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新编》内篇二《文德》,仓修良编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,第80页。

② 侯百朋:《高则诚南戏考论集·高则诚诗文汇辑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,第72页。

③ 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六,中华书局1965年版,第1457页。

④ 钱谦益:《跋王原吉梧溪集》,载《初学集》卷八十四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,第1765页。

有“为父绝君，不为君绝父”^①的说法。孝又是根本性的，是一切教化的源头，故《孝经·开宗明义》云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”孝义和忠君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故《孝经·广扬名章》孔传曰：“能孝于亲，则必能忠于君矣。求忠臣，必于孝子之门也。”

《琵琶记》同样演绎忠孝故事，观上所述，能不怆然动入道之思？

二、琵琶写怨

古人往矣，九原不作，今人何以窥见其人心事？余英时以为言为心声，苟善解古人之言，则古人之心未尝不可见。“昔朱子为《韩文考异》、《楚辞集注》，即由古人之言以通其心于千百年之上；既得其心焉，又转据之以定其言之真伪。此亦考证之一道也。”^②居今之世，欲发皇高明之心曲，朱熹所用之手段，亦不妨一用之。

《琵琶记》副末开场云：“不关风化体，纵好也徒然。”“论传奇，乐人易，动人难。知音君子，这般另做眼儿看。休论插科打诨，也不寻宫数调，只看子孝与妻贤。”^③这说明插科打诨、声调唱腔皆其外在，作者希望知音君子别具只眼，“子孝妻贤”的风化问题才是其中的焦点。下面从文本出发，虚心涵咏，试图由高明之言以通其心于数百年之上。

【瑞鹤寿】十载亲灯火，论高才绝学，休夸班马。风云太平日，正骅骝欲骋，鱼龙将化。沈吟一和，怎离双亲膝下？且尽心甘旨，功名富贵，付之天也。（第二出）

这是伯喈第一次出场的唱词，开腔即是“高才绝学”、“鱼龙将化”，表明他是

① 李零：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31页。

② 余英时：《增订版自序》，载《方以智晚节考》（增订版），三联书店2004年版，第4页。

③ 钱南扬：《元本琵琶记校注》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，第1页。本文所引《琵琶记》，皆出此书，不另注。

将功名富贵置于首位，只是沉吟之余，才念及年迈双亲。

【一剪梅】浪暖桃香欲化鱼，期逼春闱，诏赴春闱。郡中空有辟贤书，心恋亲闱，难舍亲闱。（第四出）

这是伯喈第二次出场的唱词，开腔还是“鱼龙将化”、“诏赴春闱”。只是家有双亲，一时割舍不下。

【忒忒令】你读书思量要做状元，我只怕你学疏才短。〔生白〕我不曾才短。〔旦唱〕只是《孝经》、《曲礼》，你早忘了一半。〔生白〕我不曾忘了。〔旦白〕你身曾忘了。〔唱〕却不道夏清与冬温，昏须定，晨须省，亲在游怎远？（第五出）

五娘对伯喈进京赶考是不赞成的，她指责伯喈一心要做官，学行不一。“身忘”之说，尤堪玩味。《孝经》、《曲礼》即便可以倒背如流，若不曾践行，与遗忘没有两样。

【画眉序】扳桂步蟾宫，岂料丝萝在乔木。喜书中今日，有女如玉。堪观处丝幕牵红，恰正是荷衣穿绿。

【滴溜子】漫说道姻缘，果谐凤卜。细思之，岂我意欲？有人在高堂孤独。可惜新人笑语喧，不知旧人哭。兀的东床，难教我坦腹。（第十八出）

伯喈考中了状元，俗语所谓的“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一朝化为现实。因此，对再婚牛府，伯喈虽不曾完全忘却旧爱，但亦满心欢喜。

【前腔换头】柳荫中忽听新蝉，更流萤飞来庭院。听菱歌何处，画舫归晚。只见玉绳低度，朱户无声，此景尤堪恋。起来携素手，

鬓云乱，月照纱窗人未眠。（第二十出）

一面思念旧人，一面与新欢携手共游。蔡伯喈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物，在出世与入世，孝子与不肖之间挣扎，内心交战不已。

伯喈在京做官数载，竟无家书一封。蔡公临歿之际，嘱托邻人曰：“张大公，凭着你留下我这一条拄杖，怕这忤逆不孝子蔡邕回来，把这拄杖与我打将出去！”（第二十二出）“忤逆不孝”，这是蔡公对伯喈的最后定论。

五娘进京寻夫前祭奠公婆时说：“公公，婆婆，非是我寻夫远游，只怕你公婆绝后。”（第二十八出）蔡伯喈是独子，他宦游不归，家里祭祀无人。况且，五娘更担心他停妻再娶。事实上，伯喈此时已入赘牛府了。按照传统，以牛丞相富贵独女之家，入赘者意味着要改换门庭，所生子女要从女方姓氏。对于蔡家而言，这意味着绝后。因此，五娘进京寻夫，实担负着为蔡家延续香火的重任。

五娘书馆题诗，明确指责伯喈名节有亏：

昆山有良璧，郁郁珣璠姿。嗟彼一点瑕，掩此连城瑜。人生非孔颜，名节鲜不亏。拙哉西河守，胡不如皋鱼？宋弘既以义，黄允何其愚！风木有余恨，连理无旁枝。寄语青云客，慎勿违天彝。（第三十五出）

吴起母死不奔丧，黄允休妻攀高枝，伯喈一身而兼之。

张大公亦指责伯喈：“他中状元做官六七载，撇父母抛妻不采。”历数他三不孝逆天大罪：“生不能事，死不能葬，葬不能祭。”（第三十七出）伯喈不孝，此为定讞。

最后庐墓一节，尤堪留意。孝子庐墓，按惯例要清心寡欲，不食酒肉，远离妻妾。而伯喈不但与两位妻子一起庐墓，况且墓前饮酒，严重违反礼制，居然还受到皇帝的褒扬，这一切充满了讽刺。此是最后一出，卒章显志。

从文本出发，细味文意，我们能够感知作者之用心，此剧创作之动机乃

在于讥刺蔡伯喈这个不孝不忠之人。其实,作者之用心,明清不少人已经感知到了。如陈继儒就说:“读一篇《琵琶记》,胜读一部《离骚》经,纯是一部嘲骂谱。”^①毛宗岗也说:“全忠全孝蔡伯喈,予窃疑焉。生不能养,死不能葬,何谓孝乎?辞官不得,日日思乡,将国而忘家之谓何?而名之曰忠也?”^②

三、蔡伯喈的原型问题

蔡伯喈是剧中的主人公,而历史上亦有一真实蔡伯喈。历史人物蔡伯喈是戏曲人物蔡伯喈的原型吗?古今不少论者对此持否定意见。周亮工《书影》云:“高则诚传奇,即云有所讥刺,假借托讽,何不杜撰姓名,行其胸臆,乃一无影响,遂诬古名贤若是,诚所不解。”^③现代学者如浦江清说:“我想蔡二郎原不是蔡邕,由二郎到中郎,从蔡中郎变成蔡伯喈,以讹传讹,作为《琵琶记》中人物。”^④孙崇涛认为蔡二郎之变成《琵琶记》中的蔡伯喈,不过是“张冠李戴”、“移花接木”的结果。^⑤即便现在,持此论者亦不在少数。好像历史上的蔡邕真的和戏曲中的蔡伯喈毫无关系。^⑥

就剧本而言,作者明白表示汉末之蔡邕与剧中之伯喈是有关系的。《琵琶记》第二十一出所谓焦尾桐者,即出自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:“吴人有烧桐以爨者,邕闻火烈之声,知其良木,因请而裁为琴,果有美音,而其尾犹焦,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。”^⑦所谓“螳螂捕蝉杀伐声”者亦出自此处。第四十二出庐墓一节“枯木生连里之枝,白兔有驯扰之性”,亦出自《后汉书》蔡邕本传:“邕性笃孝,母常滞病三年,邕自非寒暑节变,未尝解襟带,不寝寐者七旬。

① 高明:《琵琶记》,徐明校点,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,第98页。

② 转引自赵景深《蔡伯喈琵琶记》,载《元明南戏考略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,第50页。

③ 周亮工:《书影》卷十,四库禁毁书丛刊(补编)本第34册,第416页。

④ 浦江清:《无涯集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,第97页。

⑤ 孙崇涛:《关于蔡伯喈疑案》,载《戏曲研究》第52辑,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版。

⑥ 黄仕忠等学者认为历史人物蔡伯喈与剧中人物蔡伯喈是有关联的,但其论与本文侧重点不同。参见黄仕忠《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地区〈琵琶记〉论争录》,载《戏曲文献研究丛稿》,“国家”出版社2006年版。

⑦ 范曄:《后汉书》卷六十下,中华书局1965年版,第2004页。

母卒，庐于冢侧，动静以礼。有菟驯扰其室旁，又木生连理，远近奇之，多往观焉。”

东汉末的蔡邕本是一个孝子，为何南宋以来的通俗文学却视之为不孝之人呢？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其与董卓的关系上。初，董卓召伯喈，伯喈称疾不就。卓怒曰：“我力能族人”，蔡邕遂不旋踵而出（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）。蔡邕之仕董卓，本为逼迫，后为董卓器重，遂视奸臣为知己，忘却了君臣大义，从这个意义上说蔡伯喈就是一个不忠之臣。《三国志》卷六《董卓传》裴松之注引谢承《汉书》云，蔡邕闻董卓死，有叹息之音。王允责之，邕谢之，愿黥首为刑，以继汉史。允曰：“昔武帝不杀司马迁，使作谤书，流于后世。方今国祚中衰，戎马在郊，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，后令吾徒并受谤议。”遂杀之（《三国志集解》魏书六）。可见，蔡邕在其生前即被视为佞臣。对于蔡邕的依附董卓，王夫之评之曰：“邕之应董卓召而历三台，此何时也？帝后弑，天子废，大臣诛夷，劫帝而迁，宗庙烧，陵寝发，人民骈死于原野，邕乃建议夺孝和以后四帝之庙号，举三代兴革之典礼于国危如线之日，从容而自炫其学术，何其愚也！”“邕盖欲修怨于灵帝，而豫窒其称宗之路，邕于是而无君之心均于董卓，王允诛之，不亦宜乎？”^①

蔡邕在宋代以后，尤其在鼎革之际，为人贬斥，与重视节义的社会风气不无关系。陈寅恪在评论宋代世风时说：“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，晚撰五代史记，作义儿冯道诸传，贬斥势力，尊崇气节，遂一匡五代之浇漓，返之淳正。”^②作为宋人的代表，王应麟就对伯喈颇为不满：“蔡邕文，今存九十篇，而铭墓居其半，曰碑，曰铭，曰神诰，曰哀赞，其实一也。自云为《郭有道碑》独无愧辞，则其心可知矣。其颂胡广、黄琼，几于老、韩同传，若继成汉史，岂有南董之笔？”（《困学纪闻》卷十三）又世传蔡邕曾秘玩《论衡》一书，王应麟论之曰：“《论衡》，盖蔡中郎所秘玩。而刘氏《史通》讥之曰：‘充自纪述其父祖不肖，为州闾所鄙，而答以瞽顽舜神，鲧恶禹圣，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，何

① 王夫之：《读通鉴论》卷九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234页。

② 陈寅恪：《赠蒋秉南序》，载《寒柳堂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162页。